

## 來蓋博物館吧！

### 從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的興起看傳統華人社團的轉型與發展

王麗蘭<sup>1</sup>

#### 摘要

二〇〇〇年以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出現了一波蓋博物館的行動。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普遍認為博物館是華人社會作為面對國家霸權的文化抵抗的工具。本研究耙梳了華人博物館的起源、背景、以及組織等的定義問題，並檢視在馬來西亞在著重馬來伊斯蘭文化的國家文化政策的實施之下，華人傳統社團為何會在二〇〇〇年之後，才展開博物館建設的行動。其中，本研究亦在釐清這些蓋博物館的決定由誰來做、資金從哪裡來等基本問題之後，試圖了解華人博物館與傳統華團組織的關係，並討論傳統海外華人社團研究中的組織轉型與發展問題。本研究主要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為主，以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輔以文獻資料研究，初步發現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開始出現以新型態的華人博物館社團或組織。這些新型態的組織成員仍然是以華人為主，目標是以文化資產保存或地方社群為主，成員們不一定具有特定傳統華團身份（如血緣性社團或鄉團）。隨著這些新型態的華團的成立，又進一步牽動了傳統華團的能動性，迫使傳統華團（如福建會館、客家會館等），也加入了興建博物館的行列，呈現出在二〇〇〇年如同雨後春筍般的華人博物館景象。本研究認為，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出現新的博物館社團，也進一步開闢了新的文化競技場，在歷史論述與族群文化展示場域中，對外與馬來族群掌握的文化霸權爭奪國家的歷史論述權，對內則與不同的華人社群或方言群進行角力，重新展現了過去方言群彼此的競逐。新世紀來臨，馬來西亞華人社團開始使用博物館這個公共文化機構來扮演公民參與的角色、補足官方歷史的缺漏以及創造了新的公共領域。

關鍵字：歷史論述；華人博物館；華團研究；組織轉型發展；文化資產保存

---

<sup>1</sup>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聯絡方式：[leelan.wong@gmail.com](mailto:leelan.wong@gmail.com)。

## Abstract

After Year 2000, there has been a wave of actions to build museum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In past research, researchers believed that museums were tools of cultural resistances organized by Chinese societies in respon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since 1970'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asons and how the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started to build museums, organizing fund-raising activi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museum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organizations.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is ca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organizations.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 study method, wit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supplemented by literature research. The preliminary discovery of this research is that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has begun to emerge with new types of Chinese museum associations or organizations, in response of the new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in Malaysia.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new types of Chinese organization, the dynam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ganization has been further affected, for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organizations (such as Hokkien association, Hakka association, etc.) to join the act of building museums. As a conclusion,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began to use the museum as a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 to play the role of civic engagement, fill in the gaps in official history, and create a new public sphere.

Key words: historical discourse; Chinese museums; Chinese Association;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 一、前言

現代博物館的模式是源自西方的概念，當馬來西亞因殖民的因素帶入了博物館的概念與建立之後，從官方到民間，漸漸為當地族群和社會所接觸、接納、理解並再造。前述各章節已經從英國殖民時期的發展談起，歷經獨立建國、經濟發展之後，馬來西亞的博物館已經逐漸發展出本土特色，在影響甚鉅的國家文化政策（一九七一年）頒佈並實施的五十年間，馬來西亞的公私立博物館的發展在一九九零年代到兩千年代來到顛峰時期。

筆者在本文中將焦點對準民間社會對博物館的參與，並分析其背後的動力、行動以及與社會脈絡的關係。筆者先將民間（或私立）博物館進行統計並分類之後，發現民間博物館中佔大宗的是華人民間博物館。因此本文也針對華人民間博物館進行名詞與研究範疇的定義，並將華人博物館進行分類，以了解華人博物館的發展歷程。

筆者針對民間博物館進行了普查和統計，結果發現非官方機構成立的博物館共計約一百一十九間（截至二〇二一年年底為止），其中可分成六大類型，即人文藝術博物館（七間）、歷史文化博物館（四十一間）、綜合博物館（四間）、紀念館（十四間）、主題博物館（十九間）以及伊斯蘭博物館（三間）。以博物館的類型而言，民間博物館和公立博物館共有兩個共通點，第一個共通點是在類型上有一致的地方，都是以歷史文化博物館和主題博物館為主。第二個共通點是博物館開始大量成立是在一九八零年代開始零星建立，但直到二〇〇〇年以後這近二十年間才有了很大的突破與發展。在民間博物館中，若以族群性質的博物館來作分類，會發現其中以華人社會習俗或華人歷史文化為主的博物館佔的比重最多。在一百一十九間民間博物館中，共佔了約九十三間，約佔七成八。

民間博物館在本研究中的定義是其成立的組織是非政府組織，即社會團體或個人；資金的來源非來自政府或其相關組織，而是透過社會、民間、基金會或私人募款等方式取得經營經費。馬來西亞在二〇〇〇年以後才開始發展的民間博物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館，類型多元、頗具專業化，而且因為是民間社會或團體以社區或地方為基礎，所以也是博物館學中所指稱的「社區博物館」。基本上公立博物館的設立，是一種由上到下的建構過程，就是一種「文化國族主義」的建構方式。但民間博物館的設立，仿佛是天秤的另一端，正是作為霸權式的國族意涵形構過程中的另一個反面，保持著「文化國際主義」的立場（王舒俐，2020：71-74）。

## 二、文獻探討

當博物館的角色從私人收藏展示櫃，逐漸改變成國家認同建構的場域，到逐漸與社區結合，開放給公眾參與和互動之後，我們開始關注博物館所提供的視野與角度。博物館開始走向公共與社區，意味著作為「文化機構」，博物館勢必面對社會普遍價值觀，如多元文化認同建構。透過展覽、社區互動、不同人群的參與，博物館的行動者開始好奇，多元文化認同，是如何建構、如何被展示，以及展示了誰的認同？透過剖析這個過程，才能進一步檢視是否各種觀點或價值觀都能被公平的、公開地被討論與重視。

博物館作為社會集體記憶的場域，在新世紀面臨更多的挑戰。人的記憶是必須要透過家庭、宗教、群體來刺激（Halbwachs 1992），而博物館則承載著地方社區，乃至國家社會的集體記憶。因此，博物館作為文化與記憶的展示場域，可以反映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社會集體記憶。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博物館，一定位於某個地方，而這個「地方」的文化脈絡與不同的人群，成為了該地區博物館的核心。透過博物館展示的詮釋與再現，我們會發現人和歷史、時間和地方交會互動的遺跡。博物館的文化再現讓我們看到文物的象徵性所再現出來的是詩學（poetics），以及博物館作為一個文化機構的政治性（politics）的文化再現（Lidchi 1997）。地方文化其實是人和文化、環境、人群長時間互動的結果。因此，博物館的文化再現應該從其社會結構與社群關係著手，再回頭檢視博物館的詮釋與再現的角度或視野。Susan Pearce 在其著作 *Museum Economics and Community*（博物館經濟與社區）一書中討論了博物館在社區中所扮演的經濟和政治的角色。她

以英國比米什博物館（Beamish, North of England Open Air Museum）的經營報告為例，揭示了博物館可以成為凝聚社區、重振社區的管道，顯示博物館置身在整體社會的政治經濟鏈中（Pearce 2000）。

不過，相較於 Halbwachs 等社會建構論者對於集體記憶的建構與斷裂的重視，「歷史論」學派的學者如 Schwartz（1982）和 Schudson（1993）等認為固然當權者有能力操縱集體記憶，但是過程也並非毫無阻礙。因為既然要論述過去，則必須要仰賴過去的經驗。Schwartz 針對美國總統林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形象轉變的研究發現，儘管林肯的形象在不同世代間、因不同歷史事件不斷被喚起並與當代連結，但仍具備一定的一致性（Schwartz 1991; Schwartz 1996）。Schudson（1993）認為，「過去」仍然蘊藏在當代的社會過程中的各種細節中，包括人們的記憶、傷痕、物件、遺物、各種約束人們討論過去的規範和規定、對歷史事件的不同詮釋角度等等，都可能成為當權者要完全操縱集體記憶的阻力。這也表示，並不只是「現在」操縱著「過去」，「過去」也仍然存在於「現在」中。

另一方面，博物館和記憶緊密相關。若和社區產生關係，博物館必定和社區的人和記憶進一步有更多的互動。學者們也發現博物館的文化的再現是充滿了詩意與政治性，特別是當文化再現與社會和社區的集體記憶、集體創傷交織在一起的時候。要了解博物館如何透過社會傳遞過去，再現社會集體記憶，Connerton 提出兩個社會記憶的操作模式，即合併的（incorporating）和銘刻的（inscribing）（Connerton 1989）。合併的方式是透過身體的活動或經驗來傳遞訊息，而銘刻的方式則是透過儲存或搜尋訊息的方式。不同社會透過博物館的建立，以及儀式性展演來悼念過去，透過物質來承載歷史記憶或集體的傷痛，也透過身體的經驗來記憶。當走進這些以紀念歷史悲劇、災難等社會集體創傷為主的博物館，例如納粹博物館、猶太人紀念館等等，我們藉由博物館建構出個人與社會記憶。透過這些儀式，進一步使得人和社會集體再次連結，博物館將集體記憶具像化，並透過參觀者的身體參與的儀式，來重新連接個人與社會集體記憶，重新找回自我認同

與社區認同。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各國重要博物館與文化創意產業和文化觀光活動結合，博物館的角色與任務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更貼近民眾與社區，被賦予文化觀光門面、國家文化藝術指標以及振興地方觀光發展的任務。博物館作為公共空間，不同的文化、族群、社區在這裡交流，在展現文化象徵性的同時，也被賦予了蒐藏與展示「國寶」的任務。博物館的角色與觀光客凝視（tourist gaze）所建構而來的地方知識產生更多的對話空間。博物館展覽是文化的內容，不只可以用一個中性的、平穩的、中立的區域去解讀，而且不同行動者，會帶來不一樣的意義、激發出不同的火花。從眾多後殖民國家的博物館可見，博物館作為接觸區，不只是西方文化和殖民地的遭逢，還有個人和社區和博物館的接觸與互動。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博物館的公共性（public）的課題，因為這是其中一個突顯博物館特性和重要性的地方（Barrett 2011; McClellan 1994; Weil 2002）。在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博物館作為一個公共空間，民眾進入博物館之後兼具了公民和觀眾的身分。其展示內容也被認為是具有公共性的，更多時候是具有民主國家的政治意圖的。因此，研究者在過程中必須敏銳的觀察，觀眾／公民與博物館／公共空間的關係和距離，而這個關係必須是在雙方不斷的協商、衝突、合作與分享的過程不斷創新。

馬來西亞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才緩慢興起的民間／社區博物館行動，與歐美地區在一九七〇年代開始興起的「新博物館學」（The New Museology）運動所提倡的博物館的「社區參與」（social engagement）有許多可以對話的空間。新博物館學思潮中的兩大重點，在於「生態博物館」和「社區博物館」的提出。這也是新博物館學對舊博物館過度強調「物件」，而忽略博物館本身存在的目的以及人的元素。儘管眾生喧嘩，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當下，社區博物館已經有些式微，但由於馬來西亞在二〇〇〇年以後才逐漸引入該思潮，因此在當地本土博物館發展的視角上，我們還是得先回過頭來了解當時新博物館運動下的社區博物館的概

念。

Harrison 主張新博物館學正是博物館學面臨的典範轉移，從傳統博物館學所重視的蒐藏、保存、研究和展示的目光，轉而望向人、社群和社區的需求與參與；博物館的存在目的不再只是一個「機構」，而是「溝通過程」(Harrison 1994)。在這個過程中，博物館與社區的關係更被重視與關注，包括社群和社區裡的不同行動者，例如移民、藝術家、學校、人民團體等 (Brown 2008; Karp 1992)。因此可以說，當一個地方開始廣泛出現社區博物館的時候，研究者要更謹慎看待其背後所代表的「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 與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概念在博物館中的實踐 (Sandell 2002)。這些融合或排除是多元面向與角度的，包括性別、階級、族群、地域等。社區博物館的建立，可說是對過去這類集權的、少數菁英的詮釋權力的一種反動，而變成了社區賦權 (empowerment) 的參與方式。社區博物館的出現，挑戰了過去威權式的知識詮釋與「單一史觀」或「唯一故事大綱」般的國家認同建構，而開始進行去中心化的行動，展現不同的地方特色與認同 (Ardouin, et al. 1995; Karp, et al. 1992)。所以當社區博物館開始建立，並為社區而建、為社區所用，在博物館社區化的過程，可能得以讓被社會排除的人被納進整個博物館的知識體系內。因此，社區／民間博物館在這個文化整合、地方知識的轉化過程的作用與影響是關鍵的 (Silverman 2014)。

馬來西亞華人民間社會的博物館行動為何而起、如何扮演新博物館的角色、如何與社區互動、如何自我定位？為甚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在近二十年才開始投入博物館的建設？其背後的民間力量、社區動員、民意基礎從哪裡來？除了博物館運動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類似的社會社區行動，與博物館的運動殊途同歸？換句話說，透過研究「為什麼華人社會要設立民間博物館？」、「這些華人民間博物館有哪些屬性或特性？」、「由誰所設立、有甚麼目的、目標或遠景？」、「這些民間博物館設立的地點都集中在哪裡？」、「與族群歷史、地理環境有何關係？」等等，這些都是本文要解答的問題，故若能透過本研究得出結論，筆者認為這是馬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來西亞乃至海外華人社會研究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華人民間博物館重要的關鍵時刻，進一步更可以開啟馬來西亞博物館界與民間博物館互動的契機。

### 三、華人博物館定義、類型與發展歷程

筆者進一步針對民間博物館中，簡單的「華人」和「非華人」博物館的分類後，發現具有華人元素的博物館多達九十三間，約佔總數的八成，這個比例在馬來西亞民間博物館中算是相當懸殊的比例，也可說二〇〇〇年後是馬來西亞華社的文化資產保存意識與行動的開端。因此藉由博物館來了解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變遷與發展，也是一個近代華人社會中重要且關鍵的研究課題，藉由分析華人博物館成立的目的、目標和功能，了解華人社會目前的概況。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具普遍概念下的「馬來西亞的華人博物館」。跟據吳小保<sup>2</sup>(2019)針對馬來西亞華社民辦博物館的構想形成進行了歷史文獻的爬梳，透過報章資料的報導、華團會館的刊物等資料，吳小保發現「民辦文物館」的構想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由馬華公會以及一些鄉團組織所零星地發起的文資保存的構想，但當時都只停留在倡議的階段，未到實際付諸於行動的時機。儘管如此，自一九九〇年代開始盛行的臨時展演空間，即「文化村」和「文化節」，卻在當時承擔起華社因「國家文化政策」而產生的集體焦慮（吳小保 2019）。而實際上成立博物館的行動從一九九〇年代陸續開始，直到二〇〇〇後才逐漸興起，到了二〇一〇年以後開始進入鼎盛時期。儘管如此，相關研究屈指可數，因此從前人零星的研究和筆者實際的田野調查的民族誌資料，希望能對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的興建及其歷史背景和發展歷程有更深的認識。以下將針對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華人博物館」等名詞進行釋意和定義，並將博物館的興建年份和類型進行歸納和整理，作為後續進行個案研究的基本數據資料。

---

<sup>2</sup> 吳小保為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員，研究興趣在華馬文化比較、馬華文學等。其研究論著刊登在當地中文學術期刊上。而華社研究中心是華社所創辦的研究機構，宗旨是收集當地社會的政經文教資料，以及進行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



### 3.1 華人博物館的名詞定義

本文的研究對象，馬來西亞的「華人博物館」是一個具普遍性質的名稱，它所指涉涵蓋的，包含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普遍所使用的名稱，例如：「文物館」、「文化館」、「故事館」、「紀念館」、「校史館」、「歷史走廊」或「歷史文化中心」等等，只要是「由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包含個人、群體或組織，在特定與刻意規劃的空間中進行公開以及非暫時性、非短期的策展，而展示之內容以圖片、文字、影音、文物等方式為主」，將為本研究所指涉的「華人博物館」研究範疇內。就地理位置來說，本研究目前以上述位於馬來西亞國境內的博物館為範圍。

至於「華人博物館」指的是甚麼？筆者歸納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和需要、華人社會本身所具備的特性，以及筆者在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二一年間所進行的田野調查資料，最終整理了本文研究對象「華人博物館」的操作型定義如下：

- 一、由華人社會組織，如社群、傳統華團、華教團體、華人宗教組織等非政府組織等所創立的博物館。
- 二、博物館展示的主題和內容與華人社會、歷史、文化、產業發展等相關。
- 三、使用以華文為主的語言做展示內容的語言，並以其他語言作為輔。

筆者認為，只要符合上述三個條件的任一條件，就納入本研究「華人博物館」的研究範疇內。筆者認為第一、二項的定義，已經是大家對「華人社會文化」的基本共識。因為就華人社會文化的特性而言，必定指稱其族群、宗教、社團、教育、語言等領域。至於「華人社會組織」係指那些由華人社團、華文學校、華人宗教組織等具有華人特性的組織、團體或社群所進行的和華人相關議題和主題的博物館行動。而至於第三項定義，「以華文作為博物館展示內容的語言」，也是本研究所看重的一點的原因在於，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華語或華文是「華人社群」重要的表徵與認同依據。從馬來西亞許多重大的華社抗爭運動中，例如：一九六二年因不接受改制而變成華文獨立中學的六十一間中學、一九八七年「茅草行動」因政府派遣不諳華語的教師到華小擔任要職而引發華社不滿，進而引發異

議人士逮捕行動和中文報章被令停刊的事件，都是因為「華語」而起的爭議。因此，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中，華語或華文可以說是華人重要的身份辨識與認同要素之一。因此，筆者將之列為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博物館所需具備的條件之一。

而至於文中幾個經常使用的名詞，包括「地方博物館」、「社區博物館」、「民間文物館」、「民辦文史館」等，在本文中將依據脈絡和情境的不同而交替使用。不過必須理解，由於馬來西亞的特殊政治社會環境使然，在本文中的華人博物館，可以說幾乎都是民間辦理的博物館<sup>3</sup>，即都是私立博物館。至於經費來源，通常是來自會館或社團的經費，或者向華人社會募款。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募款的行為和機制有悠久的歷史。長久以來，在特殊的政治情境下也沒有太大的改變。無論是會館或學校，只要是涉及到「建設」，伴隨而來的就是募款。因此這些民辦博物館可能同時具有「地方性」，屬於社區或學校。為了讓方便寫作和閱讀，本文將主要以「民間博物館」來指稱本文的研究對象，但在行文中有時候也會使用「地方博物館」、「社區博物館」或「文物館」以便符合特定的行文脈絡。

### 3.2 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發展歷程與現況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建立博物館（包括文物館、校史館、故事館、紀念館等）大致上可說是在二〇〇〇年以後的事。根據林連玉基金會在其出版刊物《林連玉紀念館通訊》(2014)的試刊號中，特別出版了一份全馬各地的民間博物館清單，也展現了林連玉紀念館試圖串聯全國各地民間博物館的企圖心。在當時的清單中並不包含校史館，因此該名錄僅列舉了三十六間博物館。而吳小保做了更細緻的調查，將馬來西亞的華人民間博物館的清單製作出來，共列舉了五十八間(2019: 13-14)。徐威雄認為若加上華文小學和華文獨立中學的校史館，估計應約有八十餘間(徐威雄 2019)，本研究經過資料的統計和整理，截至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底，

---

<sup>3</sup> 除了砂拉越的「華人歷史博物館」(Chinese History Museum, *Muzium Sejarah Cina*)，實為州立博物館，乃馬來西亞的唯一特例。

共計九十三間<sup>4</sup>，發現確實如此。

儘管本文不是以量化研究為主要的研究取向，不過筆者認為對於整體社會情境的了解有其必要性。而對於上述兩份關於華人博物館的清單，有明顯數量上的差異，筆者認為有五個主要的原因，歸納如下。其一，近二十年來儘管有將近六十間華人民間博物館興起，但是由於沒有統一的管理機構，彼此之間缺乏交流與互動，呈現各自為政的狀況，在實務工作和統計上也很難有突破，間接造成了數量上的不一致。其二，華社仍然缺乏博物館研究以及相關知識和論述的生產機制，其反應出來的是對於這一新興現象的了解不足，對於博物館的類型與性質也不甚了解，因此直接導致博物館類型的定義上的不同。其三，作為民間博物館，經費依靠門票、社團、社會大眾的支持，在沒有穩定的資金挹注的現實情況下，面臨歷史建築或老房子的維護維修費、設備再升級、經營策略與方針等都是民間博物館經營的難題。許多到最後只剩下招牌而沒有能力對外開放的博物館也不少。一些倒閉或經營不善的博物館亦造成了統計數量上的落差。其四，也因為早期民間博物館的成立目的，是為了保存文化文物而設立，通常是為社區而建，並非為了遊客，因此在宣傳上未必會下足功夫，使得相關資訊無法流通。其五，儘管目前華人博物館研究屈指可數，但各自對於華人民間博物館的定義不同，遂造成數量上的差異。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先將定義釐清以便進行整體數量的整理和統計，以便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論述。

至於華人民間博物館的分類，徐威雄<sup>5</sup>根據博物館的屬性分成四類，即（1）地方文物館、（2）華校校史館、（3）名人紀念館和（4）主題文物館。第一類地方文物館以展示華人在地歷史文化為主軸，數量最多，尺度也從小至一個新村<sup>6</sup>、

---

<sup>4</sup> 本研究的統計數據到截至 2021 年底為止。到了 2022 年 1 月 9 日，又有一間華人博物館正式開幕，即森美蘭客家文化博物館，因此目前暫不計入本研究的統計表中。

<sup>5</sup> 徐威雄是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高級講師，也是林連玉紀念館館長。學術研究專長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以及新馬華人社會史，長年推動文物館、校史館的建立。

<sup>6</sup> 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研究中，「新村」專指在戰後英殖民政府為防止散居各地的華人暗中資助馬共份子，故在各地所建立的集中居住地，當時還設有宵禁等政策，至今被視為是近代當地傳統華人社會重要關鍵。

大至州縣的範圍，內容上包括地方開發史、會館沿革、方言群遷徙、民俗與民生文化等等（徐威雄 2019），可說是華人社會文化的範疇都包括在內。筆者認為，上述的分類相當符合當前博物館的類型，也可以清楚看出各類型博物館的發展趨勢。不過，基於研究目的的不同，本研究將以設立的機構為主要分類方式，另輔以其博物館的類型以及展示內容，綜合考量下再分成以下四大類型，並依序從數量最多到最少，即甲類<sup>7</sup>是華人社團和華校附設博物館（四十八間）；乙類是地方文化博物館（二十四間）；丙類是宗教團體、家祠、義山附設博物館（十一間）；以及丁類是人物紀念館（十間）。根據筆者截至二〇二一年底的統計結果，全馬各地的華人民間博物館，共計九十三間左右（如表 1）：

表 1 馬來西亞華人民間博物館類型與設立分期列表

代 類型	年	新經濟政策時期		國家宏願政策時期		總計
		1981-1990 年	1991-2000 年	2001-2010 年	2011-2021 年	
甲 1、華校所建博物館			2	7	14	23
甲 2、傳統華團所建博物館				7	18	25
乙、新型態華團所建主題式、地方博物館	1		2	3	18	24
丙、宮廟、家祠、義山等組織所建博物館				5	6	11
丁、人物紀念館或故居			1	5	4	10
總計		1	5	27	60	93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統計

在這一波全國性的設立華人民間博物館的風潮中，馬來半島東海岸和東馬的沙巴也加入了設立博物館的行列，使得全國除了半島北部的兩個州<sup>8</sup>沒有華人民間博物館之外，華人民間博物館可說是遍佈全馬十一個州和吉隆坡地區。

除了從博物館的成立年份中看出各個博物館行動的多寡來推估背後的社會動員的力量之外，筆者發現在近十年來所新建的博物館，在類型上亦有變化。首先，筆者認為甲類博物館在數量和類型上的增長值得深究。在本文定義中的華校

<sup>7</sup> 為了更細緻地瞭解甲類博物館中傳統華團和華文學校所設立的博物館各佔多少數量，故筆者將甲類進一步分成甲 1 類為華人社團附設的博物館，而甲 2 類為華文學校附設的博物館。

<sup>8</sup> 這兩個沒有華人博物館的州是馬來半島西海岸最北邊的吉打州和玻璃市州。

（甲 1 類）和傳統華人社團（甲 2 類）所設立的博物館，展示了華人方言群、籍貫、遷徙相關的內容。從 2000 年代開始，這類博物館在數量和發展速度上居各類博物館首位，共計 48 間，遠高於其他類型博物館。但其中有 23 間是校史館或由學校所設立的博物館，顯見華文學校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和社團中仍然是一股相當持續穩定的力量，不僅以「母語教育」為訴求，也逐漸開始走進社區。而甲 2 類的博物館中，有二十五間是由傳統華人社團、鄉團等所設立的博物館，例如客家博物館、福建會館文物館等等。這一類博物館是由原有的傳統華團延伸出來的附屬組織。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從表 1 可以看出，相較於華校，會館或傳統社團設立博物館的起步相當晚，在華校和其他新型態社團開始成立博物館之後，才在最近的十年加快了腳步，跟上了這一波博物館行動。華校在一九九〇年代就已經率先成立了兩間校史室<sup>9</sup>。傳統華團直到二〇〇一年加影瓜拉冷岳社區文物館和吉隆坡沙叻秀大同文物館成立之後，才開始逐漸帶動起華團和華校設立博物館的風潮（徐威雄 2019）。

甲類的博物館的建築特色，由於是學校和會館所設立，因此通常空間安排在學校內或會館內，空間的大小從一面牆到一個小儲藏室的空間，到獨立的建築物都有，不一而足，視設立的團體的資金和目的為主。而策展內容則以地方開發史、學校創辦史、產業發展、移民遷徙、會館沿革、族裔特色等為展示主軸。筆者在二〇二一年訪問瓜拉冷岳社區文物館的創辦人已故李成金先生時，他提及在設立該社區文物館的初始，他特意將在地十五個傳統華團聯合起來一起經營和管理這個文物館，並非他本人沒有能力經營文物館，而是希望能藉由這個機會活化傳統華團，期望他們走出老社團的舒適圈，走進社區。李成金這一番話背後的意思實際上就是傳統華團面臨的問題，即社團內普遍面對青黃不接的情況，年輕人不願意走進傳統華團（陳雅幼 2019; 葉章華 2016; 劉崇漢 2001），而李成金希望

---

<sup>9</sup> 這兩間在 90 年代就設立的博物館都是華文獨立中學的校史室，即新山寬柔中學文物室（1997 年）和馬六甲培風中學校史文物室（1998 年）。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藉由社區文物館的創立和經營，邀請傳統華團進行革新與進步。

學校所附設的博物館，通常稱之為校史館或校史室。華文教育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特殊情境下的產物，也是華人社會重要的面向。華文學校不僅僅是扮演教育的功能，也同時肩負族群認同建構與延續的社會功能。故華文學校的發展或華文獨立中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當地和當代的華人社會的面貌。而校史館的設立頗有水到渠成之感。在這三十年間，華文學校的地位較一九六〇年代的動盪時期穩定多了，使得校史館的成立亦趨向穩健發展。此外，在質的方面亦有明顯的變化。例如，校史館並非只是展示的空間而已，也是遺產行動的一環，芙蓉中華中學校史室還成立「校史館志工團」作為學校其中一個學生社團，例行工作除了保持校史館的清潔衛生紙外，由師生一起進行校園事蹟的紀錄與報導，以及負責校史館導覽的工作，將校史館作為資訊流通的平台（不著撰人 2017）。此外，林連玉紀念館也定期推動導覽志工的培訓課程，希望拓展與社區和華社的連結。

在二〇〇一年到二〇一〇年之間，華團和華校各設立了七間博物館，包括前述的雪蘭莪州加影（Kajang）烏魯冷岳社區文物館、吉隆坡沙叻秀（Salak South）大同文物館、檳城韓江華人文化館、詩巫的世界福州十邑文物館、巴生客家公會文物館、檳城的馬來西亞客家文物館、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新山廣肇會館文物館和新山福建會館文物室等。近十年來的風氣更勝，在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二一年之間，總共有三十二間華團和華校所建立的博物館，包括位於吉隆坡的馬來西亞客家河婆文物館、柔佛州河婆文物館、七條路文物館、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隆雪華堂吉隆坡博物館以及在疫情的陰影下依然堅持開幕的森美蘭華人文史館等等。

至於乙類博物館，可以說是「非甲類」的博物館，即不是由傳統華團或華校所建立的族群文化歷史博物館。這一類的博物館屬性與甲類可能有所重疊，例如展示內容以族群歷史文化、地方發展特色等為主。但是在筆者的分類下，最大的

差別在於，乙類的博物館的成立機構有別於傳統的華社的三緣團體（血緣、業緣和地緣），而是新型態的華人團體或組織。這些新型態的團體或組織，有些是因應博物館而成立的新組織團體，有些是因地方發展而興起的組織，與傳統華團的三緣團體在歷史起源、發展脈絡、創立初衷有很大的差異。

然而，這新興組織與傳統華團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這一類新興組織團體是因應新時代地方與社區的需求而成立，當然也有的是因為無法認同傳統華團組織相對僵化的運作模式而成立的新團體。由於新興團體成立本身就具有明確目的，因此其所建立的博物館，通常也以主題性的博物館為主，帶有各自要推動的目的。這類的博物館與傳統華團所創建的博物館在展示內容和經營策略上，也有些異同。例如甲類會館和學校所建的博物館通常不會收費；再者，傳統華團面臨組織老化與青黃不接的現象，難以再有人力來經營博物館，更遑論研究與導覽工作；傳統會館和華文學校都是歷史悠久的華團，與地方淵源極深，但也因為如此可能面臨組織結構的僵化，導致出現民間組織的官僚化現象，許多決定要經過多次會議討論、獲得大多數董監事的認同與認可後，才可能推動。而上述問題也都是甲類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乙類博物館則相對較有彈性，因為是同好們所組織的，因此在組織經營上也相對鬆散，更多時候是一人組織或一人博物館，這是乙類博物館的困境之一。

乙類博物館的總數共計有二十四間，在一九八〇年代到二〇〇〇年之間，只有零星的三間博物館。最早的是一九八〇年代在馬六甲的峇峇娘惹祖屋博物館（Baba & Nyonya House Museum）。這間「祖屋」（亦即老宅、古厝）博物館由三間排屋<sup>10</sup>所組成，為當地峇峇娘惹望族曾氏家族所擁有。該老宅博物館位於馬六甲歷史核心區，原本是峇峇娘惹的故居，現改建成博物館後仍保持著房子原本的建築形式，各居室也依照原本的傢俱和裝飾品的擺設。目前博物館為家族以文化

---

<sup>10</sup> 這裡的「排屋」指的是在東南亞城市地區，由西方殖民為發展都市所建造的住商混合的店屋（Shop houses）。通常底層是做生意的地方，後方和二樓則是住宅。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企業的方式經營，包括向遊客收取入門費、印製多語言的導覽手冊、培訓導覽人員等等。在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〇年間，又增加了兩間乙類博物館，其中一間是位於怡保的霹靂洞中山文物館，裡面收藏並展示了孫中山先生的手稿和照片等。該館的成立目的是展示並紀念孫中山在革命時期在霹靂州怡保等地的革命之路。到了二〇〇一年到二〇一〇年間，增加了三間，包括檳城娘惹博物館（Pinang Peranakan Mansion）、詩巫劉欽侯醫院紀念館（Lau King Howe Hospital Memorial Museum）和務邊文物館（Gopeng Museum）。到了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二一年間則暴增至二十三間，其中包括務邊懷古樓（Gopeng Heritage House）（已在 2021 年關閉）、近打錫礦產業工業（砂泵）博物館（Kinta Tin Mining（Gravel Pump）Museum）、沙登民間故事館（Serdang Folk Museum）、「閒真別墅」（早期客家礦家俱樂部舊址）（Han Chin Pet Soo）、希望之谷癡瘋社區故事館、吉蘭丹土生華人文物館等。二〇二〇年三月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下，仍然有新館開幕，包括雪蘭莪州的雙溪威新村歷史文物館（Sungai Way Culture Hall）、在新山的廿四節令鼓文化館（Museum of 24 Festive Drums）和在怡保的平記棧（甲必丹鄭大平建築物）（Phin Kee Chan）等。

至於丙類博物館，在本研究的定義下是指宗教團體組織、家祠或義山等單位附設的博物館。傳統華人社會的宮廟和家祠亦是重要的社會文化據點，尤其在移民社會中更是如此。從馬來西亞特殊的華人社會情境中，宮廟、家祠和義山亦不置身事外，並共同參與了建置博物館的行動。筆者將宮廟、家祠和義山組織所設立的博物館列為丙類，這類博物館起步比較晚，但也魄力十足。在二〇〇〇年代共新建了五間，二〇一〇年代則新建了六間。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宮廟和家祠所興建的博物館有個共同的特色，即和旅遊的推廣有密切的關聯，例如檳城邱公司文物館在二〇〇一年將宗祠的底層改建成文物館，展示了家祠的歷史和相關遺產修復的過程，成為了觀光客必訪的景點之一（李威宜 2019）。而森美蘭州武來岸石拿督廟文物館（Sak Dato Broga Temple Gallery）的興建就是源於在一九九〇年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代崛起成著名旅遊景點的石拿督廟，每逢六日各地的遊客和信徒到廟裡去拜拜，使得附近小鎮的成為熱門旅遊景點。廟方管理層遂於二〇一三年陸續展開新的發展計畫，包括興建文物館和草藥園等等，博物館與廟成為了一個旅遊套餐（combo），吸引遊客之餘，寓教於樂，還可以增加香油錢。策展內容包羅萬象，廣義地談到華人移民史和紀念祖先南來的歷程之外，也著重在該團體機構的歷史發展上。但同時因為是地方上的宗廟、家祠或義山，實際上其展示內容也反映了當地歷史文化發展。因此可以說，若從地方歷史文化的展示內容上分析，大致上與甲類和乙類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除了著名旅遊景點檳城邱公司文物館（Leong San Tong Khoo Kongsi's Clan House and Museum）之外，還有實兆遠墾場博物館（Sitiawan Settlement Museum）、吉隆坡廣東義山歷史文物館、詩巫衛理文物展覽館（Methodist Heritage Centre）以及馬六甲勇全殿王舡文物館等。其中最新在疫情爆發之前，搶先開幕的勇全殿王舡文物館是在二〇一八年開始修建文物館，在二〇二〇年二月已經完成兩個階段，為全馬第一間王船博物館。在馬來西亞的送王船的儀式，被稱作「王舡大遊行」。文物館內展示了王舡遊行和王爺信仰的文物和資料。館內也展示了一張一九一九年在馬六甲的王舡遊行的老照片。勇全殿每年在十一月中旬舉行王舡大遊行。除了文物館之外，勇全殿也將在馬六甲皇京港打造王舡區，並設立王舡紀念碑。該館的興建預計會耗資約兩百萬令吉，大部分的資金是由信眾們捐贈。未來的計畫，文物館也將仿造當年的王舡的模型，開放讓民眾參觀。由於目前文物館尚未完成，館內只有展示了簡單的圖文以及部份遊行用品。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西亞與中國合作，在二〇二〇年以「送王舡」申遺成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使得該館委員會更積極地完成文物館的設計和佈置，並期待在疫情結束之後重新開放。

最後丁類的博物館係指名人紀念館，在本研究的定義下除了偉人、名人、歷史人物紀念館之外，也包含了故居博物館。丁類博物館數量也不多，全國大約只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有十間左右，除了一九九〇年代的一間，在二〇〇〇年代設立了五間、在二〇一〇年代新設立了四間。最初的名人紀念館是檳城著名的張弼士故居（Cheong Fatt Tze Mansion）。張弼士故居，又稱「藍屋」，原是中國商人兼僑民張弼士（1841—1916 年）的府邸。其後代一直在這裡住到一九八九年過世為止，後由檳城一群古蹟保護人士買下這棟破舊的老宅並進行保存和修復工作。在一九九五年修復完畢後，以故居精品旅館兼博物館的形式經營並對外開放，除了提供民眾參觀，也開放精品酒店客房讓遊客住宿。而二〇〇〇年以後，受到整體華人社會積極設立博物館風潮的影響，名人博物館也陸續興建起來，其中包括馬六甲鄭和文化館（Cheng Ho Cultural Museum）、檳城著名華僑商人「葉祖意故居」（House of Yeap Chor Ee）、紀念華教鬥士沈慕羽老先生的「沈慕羽書法文物館」（Sim Mow Yu's Calligraphy Museum）以及華教界最具代表性的華教鬥士「林連玉紀念館」（Memorial Lim Lian Geok）。

綜觀這些名人或偉人紀念館，華人社會的紀念館大致分成有功的歷史人物（例如鄭和、孫中山等），以及近代的對當地華社、華教以及地方發展有貢獻的人士（例如陳嘉庚、林連玉、沈慕羽等）。此外，皆有具規模的基金、新型態團體所創辦並管理的「新博物館」，既在地又跨域，不只是強調其展示功能的舊博物館，而是自許為一個社區教育、文化和活動中心。例如林連玉紀念館除了其展示空間之外，亦出版半年刊的刊物《林連玉紀念館通訊》，從二〇一四年六月開始，每年六月和十二月出版。此外，也在每年十二月辦理華教節系列活動，舉辦講座、博物館導覽、林連玉精神獎等活動。而陳嘉庚紀念館近年來則是主辦許多跨文化、跨族群的講座，邀請馬來、印度學者來談相關族群文化議題，同時也長期主辦中學生常識比賽，試圖走進學校，也讓學校走進博物館。到了二〇二一年更是走向國際，串聯在中國、香港、菲律賓、汶萊等地的廈門原鄉組織，主辦「國際中學生常識比賽」，可見一個在地博物館的能動性與跨域性。

此賽事所涵蓋的範圍包括「陳嘉庚生平事蹟」、「中國近代史」、「太平洋戰爭」

「海外華人簡史」。主辦單位希望通過此賽事，鼓勵全球華人子弟見賢思齊、銘記歷史、珍視和平，學習陳嘉庚先生遺下的珍貴精神，並跟隨先生的足跡進一步探尋海外華人的歷史烙印、連接海內外華人青年，真正做到「從僑到橋」。<sup>11</sup>

馬來西亞陳嘉庚紀念館作為一個民間博物館，實際上其「在地性」本身就是跨地域的。作為一個在二十世紀時的著名僑領，在中國原鄉廈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名氣。在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下，馬來西亞華商積極尋求各式重新與「原鄉」串聯的機會，陳嘉庚作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成了當代政治經濟權力操作的象徵。

總的來說，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在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間雖然有零星的博物館，但是比較大量的設立是在二〇〇〇年以後。博物館展示主軸以歷史文化和地方文化發展為主軸，依據設立的單位和屬性可大致分成四大類型，即甲類為傳統華團和華校所設立的博物館（共四十八間）、乙類為非傳統華團設立的地方文化博物館（共二十四間）、丙類為宗教團體、家祠、義山等團體組織所設立的博物館（共十一間）以及丁類為名人紀念館（含故居）（共十間），總計約九十三間。華人民間博物館佔整體馬來西亞民間博物館約八成之多。

#### 四、華人博物館成立的社區動員與社會背景分析

二〇〇〇年以後的公民社會運動的崛起也是前所未見，包括「救救白小」運動中由受到「烈火莫息」政治改革運動洗禮的大學生介入反對華文小學被迫遷的事件（譚貞潔 2005）、淨選盟大集會（Bersih Rallies）首次開創了馬來西亞跨族群的公共協商空間（馮垂華 2021）、雪蘭莪州萬擾新村居民反抗國家能源公司在新村建立高壓電纜線的抗議行動（劉嘉美、蔡佩娟 2018）等等。其中動員最多、最大，影響力遍及全國乃至全馬的「淨選盟大集會」是由「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

---

<sup>11</sup> 資料來源：國際中學生陳嘉庚常識比賽臉書頁面上的簡介(<https://www.facebook.com/tkkquiz/>)，瀏覽日期：2021.12.12。

（簡稱淨選盟 Bersih）在二〇〇五年開始組織起來，到二〇一六年為止共舉辦了多達五次的大型集會。這一場延續將近十多年的政治改革的社會運動，是馬來西亞社會中前所未見，被視為是跨族群的大型集會，有機會可促進「跨族團結」

（trans-ethnic solidarity）公民社會運動（Lim 2017）。二〇〇〇年以後這一系列的社會運動，規模、地點、主題各異，但是卻是來自草根組織或社區動員。這些行動者偶有聯繫與重疊，逐漸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和社會面貌，連帶地影響了人民的政治與社會參與。

從數量和類型的分佈統計上得知，一九九〇年代馬來西亞華社普遍並尚未熱衷於設立博物館。如同吳小保（2019）和徐威雄（2019：88-89）所分析，當時社會上各方面條件並不成熟，只有零星的熱心人士、少數華團和華校設立小型的展覽館或歷史走廊。若說博物館的設立是文化資產保存的具體行動，實際上追根溯源其實是一系列華人文化資產被破壞的衝擊下所產生的反應，包括一九八三年的馬六甲捍衛三寶山事件、一九九一年柔佛古廟山門事件、一九九六年吉隆坡廣東義山迫遷事件、二〇一一年吉隆坡蘇丹街讓道捷運的強制徵收事件等等相關華人文化資產被國家霸權侵害、被吞噬的集體焦慮下，華人團體也開始實踐不同程度的文化保存運動。

其中一個涉及全國的就是一九八四年開始主辦的全國華人文化節，此後每年由各州的中華大會堂主辦，目的是透過文化展演活動推廣華人文化藝術表演。該文化節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開始獲得官方的認同，也逐漸凝聚了華社、累積了社會能量，間接促成了二〇〇〇年以後博物館的建立（吳小保 2019；黃文斌 2009）。另一方面，校史館的成立又得從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去探究。一九九〇年代有兩間華文獨立中學率先成立校史館，對於擁有百年歷史的華校而言，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後在各時期建立的校史館通常也是因應百年校慶而設立。華文獨立中學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史上是一個關鍵課題，它代表著少數族群權利、母語教育權、族群文化權，也是華人社會身分認同建構的重要機制。因此，華文小學和華

文獨立中學的校史館，不僅僅只是學校的歷史，其背後代表的是當地社區華人社會的歷史發展。在二〇〇〇年以後，許多的獨立中學和華文小學迎接建校一百週年紀念，無論校內外傾全力募款建校、舉辦活動來慶祝百年校慶，其中建立校史館也是整體盛大儀式下的一小環節。

若把整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發展史做縱貫性的研究，特別是華文教育和華人文化發展作為主要觀察對象，會發現二〇〇〇年以後的二十年是一個相當美好的時代<sup>12</sup>。一如馬來西亞華社在一九六〇年代度過了精驚心動魄的華文學校改制政策；一九八四年的馬六甲三保山的「保山」運動；一九八七年茅草行動逮捕眾多異議人士；一九九〇年代吉隆坡的廣東義山封山與搬遷危機；二〇〇一年雪蘭莪州白沙羅華小因校地狹小但卻位處交通要道，因而校方和教育局啟動了遷校計畫，但因涉及華社敏感的華教問題，以及在後烈火莫息時代相關社運人士的介入下，最後演變成「救救白小」全國華社關注的民主教育運動。到了二〇一〇年，雪蘭莪州萬撓華人新村因抗議高壓電興建計畫而發動「三月圍村」村民反抗運動，歷時十三年的抗爭運動終於成功捍衛家園。二〇一二年吉隆坡唐人街部分百年商店（大多集中在蘇丹街）因得讓路給捷運站和路線的發展，面臨拆除的危機，民間藝術人士發起了「保衛蘇丹街」的和平集會以及一連串的社區藝術展演活動。

另外在教育的領域方面，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專責華文獨立中學校務和發展的董總，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不斷向政府爭取承認華文獨立中學的高中文憑，以便實現多族群國家的母語教育權利，至今仍壯志未酬。同時，華社也有創辦中文大學的呼聲，名為「獨立大學」。但有鑑於當時一九七〇年代動盪的政治局勢，獨立大學運動雖然獲得廣泛的華社支持，但是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終於正式被政府否決，被華教人士視為是華教歷史上的沉痛創傷。然而在一九九六年出現了一線轉機，政府制定了私立高等教育法，當時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則在這樣的契機下成立了拉曼大學，該大學成為了華裔學生升學的主要管道之一。而在南馬的則是

---

<sup>12</sup> 截至 2020 年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為止。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南方大學學院，前身是新山寬柔中學的專科部，後在一九九〇年由當地華教人士發起成立南方學院，在二〇一二年升格成為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成為南馬華社的民辦高等學府。另外，在檳城的韓江學院的創辦之路，也與華文教育後續發展緊密相關，經過不同程度的課程的開創與設計，終於在二〇〇〇年正式開學的韓江學院成為華社民辦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在華社為華文教育尋找出路之際發展出來的新里程碑。上述三間由華社創辦的大學，雖然與原本的華文大學的形式相差甚遠，但是作為華社成功建立的高等學府，在華教運動路上，算是一個長期與威權馬來政府斡旋下的最好結果。政府與華人民間社會似乎找到了一個治理與被治理之間微妙的平衡點。

因此，筆者認為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華文教育運動在二〇〇〇年隨著韓江學院也成功獲准升格成大學學院，一個時代的抗爭似乎暫時落幕了。雖然對於華社來說，華文教育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課題，但隨著二〇〇〇年之後馬來西亞政治環境的新局勢，華人社會也開始被捲入另一個全新的公民戰場，即後烈火莫息時代的各種社會運動中，包含由非政府組織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淨選盟）所發起的 Bersih 運動、地方環保抗議運動如柔佛州邊佳蘭反石化運動、民間組織在彭亨州的反稀土廠進駐而發起的綠色盛會（*Himpunan Hijau*）等。

在如此紛亂混雜的時代，華團和華社的能動性選擇用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進行對政府的抵抗，以及我群歷史文化的論述產製。每每被馬來右翼激進政治人物在全國選舉前質問「*Apa lagi Cina mahu?*」（華人還要甚麼？），有一批相信歷史是形塑認同的最好方式、相信文化資產的保存必須靠自己來做。這一群人透過建立博物館、策劃展覽、收集文物、研究地方歷史、串聯社區等的方式，自我賦權成為博物館行動者。這群來自不同階級、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不同族群的新博物館行動者，各自帶著社區的問題、自身的議程、選擇博物館這個傳統、公共、開放的機制，透過以建立社區博物館的方式，參與國族建構的過程，並縫補了公立博物館「目光所不及」之空白處，拼貼成現代新自由主義下的自我論述、自我詮

釋的面貌。

## 五、結論

從近二十年來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博物館行動中，給了我們什麼啟發，這些行動又代表了甚麼意義？筆者認為，可以從一、「地方感」與「新故鄉」的認同重塑；二、見證新形式的華人社團的崛起；三、華人社會參與國族論述和文化遺產論述的生產過程。

首先，若先從鉅觀的角度來看，各地建立博物館的行動在近二十年可謂風起雲湧，其中一半是與地方、社區有直接關係的博物館，例如帶領吉隆坡地區社區營造與博物館設立工作的「瓜拉冷岳社區文物館」，即以當地地名為博物館的名稱。創辦人李成金一開始就不打算只是建設有形的博物館，而是把博物館視為地方的公共空間，活化社區工作。另一個例子是下一節內容中會深入探討的「務邊博物館」，也是以地方為範疇的歷史文化博物館。筆者認為這是當代地方的華人社會透過文化機構的形式（即博物館）來進行地方認同的形塑。而這個地方認同已經逐漸有在地化的趨勢，並不只侷限在過去「原鄉」、「僑鄉」的連結中。因此，可以說透過這些地方博物館的興建，華人社會已經開始進行「新故鄉」的認同重塑，從現代國家治理的角度而言，這是地方華人社會因應各種來自馬來文化霸權政策下的集體需求，在新世紀透過老方法即建立博物館的行動來進行公民的參與。

第二點，從全國性的博物館類型的統計資料中，也可以發現這種以博物館行動為主的新型式的華人社團的崛起。傳統的海外華人社會研究以鄉團、會館為主，這些超過一個世紀的社團在早期扮演了聯繫海外僑社和故鄉、結黨聯盟、慈善、社會福利與教育等綜合性功能。然而，隨著戰後民族國家的成立、華人社群的落地生根、再到移民世代的更迭，這些地方鄉團已經逐漸失去凝聚華社的功能。然而，另一方面，馬來西亞華社仍然需要能夠發揮其功能的社團或組織來為其發言、代言以及與政府進行協商工作。在本文的脈絡中，即族群文化權。會館等傳統華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人社團在初期未能投入到博物館的行動，顯示出組織的僵化以及缺乏能動性。而當另一些帶有明確的地方性色彩的組織，沒有特別的會館或政黨的庇護下，在各地創辦了不同的博物館組織，以設置展示空間為主，開始述說地方的故事。這一現象也對傳統社團帶來了影響，使得各社團開始爭相進行博物館的建設，形成互相競逐的現象。

第三點，筆者認為是透過各地博物館的成立，代表華人社會開始積極地參與文化遺產和史觀論述的產製，同時也透過建立博物館的行動，產製華社的國族認同建構，並將之與官方的國族論述進行抗衡、對話與交流。二〇〇八年，檳城和馬六甲共同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中。作為馬來西亞境內曾經的兩個海峽殖民地，成功入遺並非只是這兩個城市的事，連帶周邊城市都受到了影響。「遺產」的概念開始在地方社會上萌芽，而華社本來具有「古董」的概念，在這個從「古董收藏家」到「文化遺產」的轉換過程，他們先選擇了以「博物館」作為中介媒體，以便從古董轉化到遺產論述的生產，進一步參與史觀的生產過程。而透過各地民間博物館的設立，以及各地華社歷史的論述、地方史的再現，再分析其展示論述後，發現這是華社正在進行其所認可的國族認同建構。這個國族認同的特色是，是在地化、文化遺產化、博物館化的過程，透過組織博物館團體、建構博物館的硬體、蒐集文物和建立歷史論述，這些華社和華團善用了民間的、社區的、地方的、族群的博物館的途徑，展現族群中的「國族」與「國家」面貌，並宣示與國家機器站在同一平台上，表達其在地性的特色以及對國家和國族認同。而這樣的行動和早期對原鄉的祖國認同早已不能同日而語。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 引用文獻

Ardouin, C.D., et al.

1995 *Museums & the community in West Afric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Barrett, Jennifer

2011 *Museums and the Public Sphere*. MAlden, MA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Brown, Claudine K.

2008 *Museum, Communities, and Artists*. *Visual Arts Research* 34(2):5-13.

Halbwachs, Maurice

1992 (1941, 1952)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Ill: The 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

Harrison, Julia D.

1994 *Ideas of Museums in the 1990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3(2):160-176.

Karp, I.

1992 *Introduction: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In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I. Karp, C.M. Kreamer, and S. Lavine, eds. Pp. 1-17.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Karp, I., et al.

1992 *Museums and Communities: The Politics of Public Cultur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dchi, Henrietta

1997 *The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 *I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 Hall and O. University, eds: SAGE Publications.

Lim, Joanne BY

2017 *Engendering civil resistance: Social media and mob tactics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2):209-227.

McClellan, Andrew

1994 *Inventing the Louvre: Art, Politic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Museum in Eighteen-century Pari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arce, Susan

2000 *Museum Economics and the Communit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Sandell, Richard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2002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Schudson, Michael

1993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 How We Remember, Forget, and Reconstruct the P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Schwartz, Barry

1982 *The Social Context of Commemoration: A Study in 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Forces* 61(2):374-402.

1991 *Social Change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George Washingt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2):221-236.

1996 *Memory as a Cultural System: Abraham Lincoln in World War II*.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908-927.

Silverman, R.

2014 *Museum as Process: Translating Local and Global Knowledges*: Taylor & Francis.

Weil, Stephen E.

2002 *Making Museums Matter*.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不著撰人

2017 〈芙蓉中華校史室志工來訪：守護珍貴歷史的小尖兵〉。《培風 e 資訊》2017.11.01：4-5。

王舒俐

2020 〈迷失在認同焦慮中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化研究》30：69-82。

吳小保

2019 〈文化反抗與國家文化：馬來西亞華社民辦文物館構想的形成〉。《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8（2）：1-16。

徐威雄

2019 〈化整為零，藏富於民：馬來西亞民間文物館熱潮〉。《怡和世紀》40：88-90。

陳雅幼

2019 「華團青黃不接組織老化尋策吸引年輕人加入」。「光華日報」，<https://www.kwongwah.com.my/20190311/%E5%8D%8E%E5%9B%A2%E9%9D%92%E9%BB%84%E4%B8%8D%E6%8E%A5%E7%BB%84%E7%BB%87%E8%80%81%E5%8C%96-%E5%AF%BB%E7%AD%96%E5%90%B8%E5%BC%95-%E5%B9%B4%E8%BD%BB%E4%BA%BA%E5%8A%A0%E5%85%A5/>，2021 年 03 月 2 日上線。

黃文斌

發表於 2022 年僑務委員會「僑務發展與全球華人研究的新路徑」學術研討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23 日

本文為未完善之作品，未經許可，請勿引用。

2009 〈華人與國家文化建設：以全國華團文化節為例案研究（1984-2005）〉。刊於《勤儉興邦：馬來西亞華人的貢獻》。文平強、許德發編，頁 121-134。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

葉章華

2016 〈活動跟不上時代，華團難招年輕人〉。「東方日報」，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dfrh/2016/01/25/123937>，2021 年 3 月 2 日上線。

劉崇漢

2001 〈馬來西亞華團組織的困境與展望〉，《孝恩文化》，2021。

劉嘉美、蔡佩娟

2018 《保家衛村：萬擾反高壓電纜抗爭 13 年記事（2005-2017）》。八打靈再也：文運企業